

【史学博士论坛】

#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中“东方问题”

孙兴杰

(吉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国际关系理论, 其理由很简单, 因为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撰写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著述。这个论点难以经得起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献的考验, 1853—1857年间,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就克里米亚战争发表了上百篇评论, 而这些论述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 也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 因此, 这些经典文献为我们建立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东方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1-0074-04

## 一、经典文献中的两种“东方”

东方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同时这一问题也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大讨论。佩里·安德森认为, 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看到的亚洲国家的相似性是一种幻觉, 两人几乎全盘继承了欧洲关于亚洲的叙述, 几乎没有做任何修正, 当然, 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讯缺乏”, “因为当时东方历史研究在欧洲才刚刚起步”<sup>[1](p.520)</sup>。广义上的东方问题非常复杂, 奥斯曼帝国、波斯、印度、中国都在其中, 受制于当时的知识储备和东西方交流的限制, 要全面准确地把握东方社会的特质是非常困难的。佩里·安德森认为, 1853年6月2日,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第一次讨论东方问题, 这里的东方, 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更是一种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范畴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应该是非西方的含义。马克思提出: “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sup>[2](p.256)</sup>为什么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呢? 马克思初步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 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 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sup>[2](p.260)</sup>。

安德森认为, 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间接应该置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中, 贯穿了一种东方停滞论的观点。核心观点在于: 第一, “亚洲的干旱气候所必

然导致的公共灌溉工程, 乃是中央集权的、垄断土地的专制国家的基本决定因素”; 第二, “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基本社会细胞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村社”<sup>[1](p.507)</sup>。马克思对东方的认识与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有传承关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孟德斯鸠等人地理决定论层面, 认为所有制关系是影响国家形态、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马克思认为, 民族问题的本质还是所有制关系问题, “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 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 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 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sup>[3](p.409)</sup>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 东方处于一种落后停滞的状态, 这种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不谋而合, 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需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 只有那些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地位。“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 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 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 是没有生命力的, 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sup>[4](p.328)</sup>。

这是一种广义的东方问题, 而狭义上的东方问题则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 并没有对狭义的东方问题给出清晰的界定, 据笔者翻阅中文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是这样开始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 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的‘东方问

【收稿日期】2010-11-05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国家能力与国际体系转型——从帝国到民族国家”(20101015)。

题’。<sup>[5](p 5)</sup>马克思认为，东方问题的存在是对欧洲正统主义的挑战，也是令欧洲列强难以穷尽的问题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引起了大国竞争的野心”<sup>[9](p 9)</sup>。东方问题（即狭义上的，后文不作说明，即此含义）是困扰欧洲历史几百年的死结，自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欧洲就面临着“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当然，此时欧洲要应对奥斯曼帝国侵略的问题，在此后几百年中，奥斯曼帝国一直是欧洲难以摆脱的阴霾。18世纪后，奥斯曼帝国锋芒不再，欧洲强国围绕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博弈，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列强在“土耳其怎么办”问题上博弈的一个高潮。有学者指出在这封信中：“很久以来，欧洲便面临着一个‘东方问题’。但其实质却没有发生变化，东方问题起源于东南欧地区在习惯、观念、成见等方面东西方之间的冲突。”<sup>[7](p 1)</sup>东方问题不仅是影响欧洲国际关系几百年的死结，也是理解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透镜，马克思、恩格斯着力研究东方问题，可谓抓住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只“小麻雀”，并且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剖。

当东方问题再度成为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时，马克思正在伦敦过着贫困的流亡生活，唯一的经济收入是稿费，因此，马克思非常希望将东方问题作为一个论题撰写大量的评论，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机会深入研究与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渗入其中，以此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此时，还有一位美国人与马克思竞争撰写稿件的资格，马克思写信希望恩格斯能够出手相助，因为马克思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sup>[2](p 26)</sup>。1850年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研究有所分工，马克思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欧洲各国外交政策，恩格斯则着力于语言学、军事战略。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东方问题”也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第一，东方问题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二被压制下来；第二，东方问题是各个强国利益与野心纠结的结果，应当注意其在贸易和军事上的含义；第三，如果东方问题引发欧洲战争，英国将会站在土耳其一边；第四，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发生崩溃，因为它已经或多或少处于欧洲文明影响之下<sup>[2](p 26)</sup>。可以说，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东方问题”写作计划的论题范围与论调，恩格斯在回信中对马克思的想法当然是鼎力相助，他建议马克思：“我们应该装成洞悉内情的样子去打垮与我们竞争的美国佬”<sup>[2](p 229)</sup>。同时，恩格斯也会着手集中精力研究东方问题，以期与马克思更好地合作。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集中而深入地研究与论述了东方问题。

## 二、马克思恩格斯解读“东方问题”

从1853年4月7日起，《纽约先驱论坛报》在3年

内刊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上百篇时事评论，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东方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评论为我们留下了19世纪中期，这场重要的国际战争翔实而可信的记载与分析，尤其可贵的是马克思利用当时披露出来的外交公文对东方问题的利益逻辑进行了详细的阐发。

马克思将东方问题置于欧洲的大背景中，追溯东方问题的来龙去脉，历史渊源与现实困境；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中，立体呈现东方问题所内含的种种利益纠葛与纷争，篇篇铿锵有力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依然有种强烈的现场感。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问题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债券价格、粮食价格、工业危机、罢工等议题连为一体。如果不洞悉各国财政、贸易、金融领域的发展，就难以对战局有精确的判断。例如，马克思发现，为了应对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格莱斯顿在英国首次发行国库债券以弥补财政亏空。但此举并未获得成功，由于战争及其农业歉收导致粮价上涨与贵金属外流，而贵金属外流则推动利率上涨，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波动，固定利率的国库债券则问津者变少。由此，马克思判定，“东方问题影响了国家有价证券，而宫廷本身则利用证券行情的波动进行危险的交易。”<sup>[2](p 308)</sup>马克思的分析视角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有所启发：第一，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二者紧密互动，马克思说：“不列颠的小市民不仅必须为对俄战争、为格莱斯顿先生的教友派学说和伪善的拘泥细节而付出费用，还应当供给沙皇本人以进行对英战争所需的资金。”<sup>[8](p 242)</sup>因此，国际关系需要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直接作用于国际关系。第二，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重视经济因素，因为现代战争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各国的财税金融实力是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因素。

简单而言，东方问题的起因是奥斯曼帝国衰落之后，欧洲列强如何瓜分和接管这个庞大帝国遗产。世界历史上帝国的兴衰沉浮也属正常，但奥斯曼帝国却因为纠结了太多的利益与历史恩怨而成为困扰欧洲国家体系的“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东方问题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两位作家认为，奥斯曼帝国已经陷入持续的衰落之中，土耳其如同一匹死马，在不断地腐烂下去，土耳其的存续取决于欧洲均势体系的维持，欧洲各国的权力运作最终以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 status quo 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因此，它将不顾所有的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经常地每年在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任何一种腐烂物体向周围大量放出朝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sup>[5](p 7)</sup>。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使这个老帝国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肥肉。

东方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各种利益与历史盘根错节，犹如一个难解的戈尔迪之结一样。奥斯曼帝国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亚洲部分、非洲部分和欧洲部分。亚洲部分主要是巴勒斯坦与基督徒居住的黎巴嫩平原，小亚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来源，尽管人口并不多，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属于土耳其族的狂热的伊斯

兰教徒群, 目前就休想去征服它”<sup>[5](p.7)</sup>。非洲部分, 距离帝国统治中心遥远, 多数行省与帝国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 非洲部分已经被欧洲强国瓜分殆尽, 几乎不存在什么“问题”。“真正经常引起纠纷的, 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个大的半岛, 即欧洲土耳其。这个地方却不幸成了各个不同种族和民族杂居的地区, 同时很难说它们当中谁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条件。”<sup>[5](p.7)</sup>正因为巴尔干地区成为帝国博弈的边缘地带,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种破碎的民族结构、宗教信仰结构, 同时各种人群生活在不同帝国的统治之下, 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与能力。在这个地区没有哪个人群可以承担起文明发展的重任, 最终是该地区成为东方问题的“源泉”。除此之外, 巴尔干地区所处的地缘位置也使其成为各国重点关注对象, 马克思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东方问题的地缘政治之结: 第一, 发源于欧洲中心的多瑙河是贯通欧洲与亚洲的通道; 第二, 谁掌握多瑙河口, 谁就掌握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 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贸易; 第三, 如果占据了高加索地区, 便可以控制黑海, 进而可以威胁波斯北部并且控制里海; 最后, 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黑海的锁钥之地<sup>[5](p.443)</sup>。

黑海海峡更是决定欧洲列强势力消长的杠杆, 恩格斯在《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一文中认为, 东方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恩格斯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两个层面论述了这一问题。首先, 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黑海及其沿岸是欧洲经济往来的枢纽之地, “三分之二的欧洲, 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匈牙利、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 在出口和商品交换方面都有天然的纽带与欧克辛海(黑海——引者注)联结起来, 同时, 这些国家主要是农业国, 产品分量, 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sup>[5](p.14-15)</sup>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使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英国需要通过奥斯曼帝国境内向亚洲出口产品, 势必与俄国在亚洲的扩张相冲突。1851年, 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 354 万英镑, 其中 2/3 以上通过黑海各港口, “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 都决定于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sup>[5](p.16)</sup>, 谁掌握了黑海海峡, 谁便掌握了亚欧贸易通道。其次,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 黑海海峡是遏制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关键所在, 由于这个海峡地势险要, 易守难攻, 如果一旦俄国控制海峡, 便可以“筑成一道攻不破的屏障, 就是全世界的联合舰队来犯也休想通过海峡”<sup>[5](p.17)</sup>。如果俄国控制了黑海海峡, 会造成多重后果: 黑海将成为俄国的内湖; 黑海沿岸尤其是高加索地区的反抗将会崩溃; 奥斯曼帝国将失去国际地位, 帝国陷入崩溃状态。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 俄国持续不断地扩张, 最终会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恩格斯认为, 对抗俄国扩张野心力量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sup>[5](p.18)</sup>因此, 遏制俄国的扩张, 不仅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稳定, 也是欧洲革命的题中之义。

东方问题的本质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清楚, 但从两位经典作家著作论述中, 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 东方问题是在东西方文明漫长的交往互动过程中产生的,

尤其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几百年的对峙与冲突。伊斯兰教本身就是法律, “可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把哥哥不同的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 即把我们分为两种国家和两种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sup>[8](p.180)</sup>。应该说, 宗教的纷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自从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来, 这种纷争便存在了, 历史上基督教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便是例证。巴尔干半岛上的东正教徒多数是臣服于伊斯兰教的居民, 1 000 多万东正教徒被视为异教徒, 并且接受苏丹的统治。西欧列强中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世俗化, 因此, 欧洲国家试图推动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进程势必会破坏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 “谁想用 code civil(民法典)来替代可兰经, 谁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结构”<sup>[8](p.181)</sup>。在奥斯曼帝国强盛之际, 穆斯林统治者将所有异教徒视为敌人, 只有获得帝国特惠权的外国人才可以自由经商。奥斯曼帝衰落之时, 帝国特惠权利便成为争论的焦点, 基督教强国希望保护到奥斯曼帝国旅行或者朝拜的居民。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起源中心, 因此, 无论天主教还是东正教都希望获得专有保护权, 而这需要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授权, 引发 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由此而起。在马克思看来, 这些喋喋不休的争吵, “不过掩盖着不仅是各个国家而且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卑鄙的战争”<sup>[8](p.187)</sup>。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地区是由各种宗教历史叠加于一体形成的破碎地带, 这种地带极可能成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之地, 无论是巴尔干地区、巴勒斯坦地区还是高加索地区无不如此, 冷战之后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背后似乎隐藏着“文明冲突”的影子, 这也充分印证了经典作家如炬的洞察力。

第二, 巴尔干地区不仅是宗教、文明的交叠之地, 也是各种民族杂居相处之地。恩格斯在《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一文中, 深入分析了作为帝国边缘的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进程、现实困境与未来前途。恩格斯批判了欧洲外交界关于维持现状的理论, 解开东方问题的死结不在于一种“鸵鸟”心态, 而是要以“革命”之剑斩开这个缠绕几百年的死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第一, 自 1789 年以来, 欧洲革命的风潮不断蔓延, 俄国作为欧洲封建专制的堡垒, 势必会成为革命的敌人, “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sup>[5](p.38)</sup>。第二, 塞尔维亚成为南部斯拉夫人解放的中心, 虽然塞尔维亚人将俄国视为保护者, 二者在宗教与种族方面相似, 但政治经济利益却大异其趣, 俄国试图控制巴尔干的市场与过境贸易, 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也希望扩张自己的贸易, 并且实现工业化, 同时, 巴尔干半岛受到西欧现代性的冲击, 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方面与俄国相异, 这些都会使独立后的南斯拉夫人与俄国人渐行渐远。第三, 南斯拉夫人依靠俄国人反抗奥斯曼帝国, 是因为不堪帝国统治的专制与独裁, 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一样都是依靠强制与暴力的帝国统治, 俄国取代奥斯

曼帝国不过是从狼窝进入虎穴。因此，只有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斯拉夫国家才能使巴尔干地区摆脱帝国边缘的命运。恩格斯已经清醒得认识到东方问题的解决之道，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毁灭与重生，而这一帝国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则得益于以下两种因素：“第一，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嫉妒；第二，巴尔干各个基督教民族之间缺乏团结。”<sup>[9](p.1)</sup>

东方问题是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需要时间慢慢冲淡宗教、利益、权力纠葛的恩怨。两位经典作家认为，唯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东方问题，这与西方资产阶级外交家、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欧洲主流外交界追求一种均势或者维持现状，这种观念与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当然，革命，不仅仅是武装起义，更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政治形态的变革。革命不仅要发生在巴尔干地区，而且奥斯曼帝国、俄国、奥地利帝国都要发生相应的革命才能使这个地区建立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否则，“三千年来发生在这个核心地区的战争将继续”<sup>[10](p.3)</sup>。东方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各个帝国内部变革来实现，对俄国而言，只有俄国人民放弃支持沙皇扩张侵略政策，放弃世界霸权的追求，“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世界战争才能得以避免，东方问题也自然会解决。因为俄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法俄之间的同盟关系将会松弛甚至会消失，因为法国不能依靠俄国来围堵德国；其次，由于俄国不再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安危，奥地利和意大利就没有必要围绕在德国周围；再次，“只要俄国不再威胁波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sup>[11](p.54)</sup>。最后，由于俄国国内的转变，欧洲两大军事阵营会自行瓦解，战争的威胁随之消失。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东方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俄国的扩张野心。

晚年的恩格斯全面审视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发展脉络，将东方问题置于俄国与欧洲互动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到19世纪末，东方问题已经不再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博弈，而是欧洲强国之间联盟与博弈的结果。“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sup>[11](p.49)</sup>。在此之际，革命与国际战争之间产生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俄国能够迅速发生国内的革命，那么就有可能避免欧洲大战，但不幸的是，恩格斯的愿望没有实现，东方问题引发了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则推动了俄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能如人所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希腊等主体民族的解放最终将使东方问题成为历史的遗迹”<sup>[12](p.10)</sup>。

### 三、小结

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克里米亚战争而展开的评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方面两位经典作家将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融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献，给予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拓宽视野，两位经典作家没有停留在概念与理论层面，而是对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多种角度的透视，将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地缘政治学等诸多视角融为一体，从而能够全面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局势发展趋势。两位经典作家生产创造知识的途径与经验为我们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二，两位经典作家在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影响广泛，借助大众传媒工具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加以传播。革命思想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两位经典作家以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完成了知识传播的过程，因此，新的理论与观念并非产生于书斋，而是来自人民而又回到人民。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变化万端，与东方问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年前的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知识，更是启发智慧，提高思考能力的钥匙。

### [参 考 文 献]

- [1] [英]佩里·安德森.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 刘北成, 龚晓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6] Chyton G. D. *Britain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Misolonghi to Gallipoli* [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71
- [7] Marriot J. A. R. *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 Diplomac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9] Stephen Pierce Hayden Dugga. *The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M], New York: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 [10] Talcott Williams. *Turkey: A World Problem of Today* [M], Toronto: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1.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12] Luigi Villari. *The Balkan Question* [M],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1905.

(作者系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晓校]